

上海小开

宋路霞 著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宋路霞 著

上海小开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序



上海小开是 20 世纪上半期上海滩一个很特殊、很时尚、很牛气，也很有趣的群体。依现在的习惯说法，他们是当年的富二代、官三代、高富帅、公子哥儿……这样的比喻或略显粗简，因为他们不但家庭富裕，吃喝不愁，而且头脑灵活，受过传统文化教育，也受租界里欧风美雨的长期熏陶。比起中原地区的富家子弟来，他们身上多了很多“洋味”——抽洋烟，喝洋酒，打网球，跳交谊舞，听爵士乐，头上和脚上一定铮亮，“裤线可以切西瓜”，总之，走在大街上，“腔式”和“派头”定规一流。

他们最初不属于社会精英，自然也不全是社会累赘；他们大多不大会赚钱，但是很会花钱；他们往往没有经营经济实体的天赋，但是很有玩的本事；他们心气很高，英语熟练，不会落伍，一辈子瞄准世界新潮流；至于能不能出人头地，他们似乎并不太在意或在乎。总之，他们是一群有钱、有闲、有聪明脑袋、有想法、有家族背景、有个人追求、天塌下来也不肯放弃自己兴趣爱好的上海男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小开所痴迷的东西往往是海派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有西风东渐中的舶来品，如爵士乐、交谊舞、网球、集邮、船模、无线电，也有中国传统的古老文化，如京剧、昆曲、围棋、文物收藏，这很能说明海派文化的交融性、广泛性，因此也很有代表性。他们中有的人沉湎在自己的爱好里，玩了一辈子，终于玩出了水平，玩出了高雅，玩出了名堂，甚至在某一领域独占鳌头，成了专家、学者。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轨迹，原本属于上流社会的一分子，但是随着 20 世纪下半期的生活动荡，他们或出国，或留在上海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尽管天翻地覆，他们对所痴迷的始终不离不弃，

所以更多了些跌宕起伏、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本书写了一帮上海滩挺有名气的小开，其中有一生都“泡”在爵士乐中的查理林、朱兆和；有从票友到名角的李家之后李家载；有一辈子没赚过钱，却捐献了无锡蠡园的王亢元；有张静江的侄子、古钱大王张叔驯；有苏州潘家之后、网球国手潘家震；有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的曾孙、收藏大家刘奎龄；有唐绍仪的侄孙、一辈子都在玩邮票的唐无忌；有盛宣怀的儿子盛恩颐、盛昇颐，孙子盛毓卹、盛毓度以及外孙庄元端。他们的心性、追求、背景、履历各不相同，但是都玩出了成绩，玩出了水平，展现了一段鲜活的无悔人生。

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大多数人正年轻，既不属于地主、老财、资本家，也不属于工人、贫下中农。他们是非常边缘的、不受重用和信任的一群，越是会玩就越是不被正眼相看，被视为不务正业、小资产阶级情调、剥削阶级的醉生梦死……正因为如此，也使得他们的人生轨迹比一般普通人更风情万种，甚至有些天方夜谭的传奇意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一种历史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折射出了一个阶层的社会变迁、人生百态的变奏、世事无常的残酷、海派文化的韧性。

这些真实故事的碎片丢之可惜，于是记下来，印出来，但愿能得到关注上海、热爱上海的读者们的喜欢。

宋路霞

2013年6月

目 录

从名票到名角

——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载 / 1

古钱大王传奇

——张静江的侄子张叔驯 / 18

小校经阁的传人

——刘秉璋的曾孙刘奎龄 / 39

邮票大王的传人

——唐绍仪的侄孙唐无忌 / 54

从“网球小潘”到网球国手

——苏州潘家之后潘家震 / 71

与体育结缘的一家

——盛家的公子们 / 86

从玩小汽车到造大卡车

——盛宣怀的外孙庄元端 / 100

不会赚钱但很爱国

——捐献无锡蠡园的王亢元 / 117

为了爵士乐来到人间

——怀旧金曲的查理林 / 134

爵士乐手的爵士传奇

——朱季琳的孙子朱兆和 / 152



从名票到名角 ——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载

南京西路附近的吴江路很早以前是一条小河，后来成了一条弯弯的马路，近些年来商铺林立，一到晚间，比数米开外的南京西路还要热闹。可是从前不是这样，吴江路不是一条美食街，那里闻不到什么油香味、麻辣味，倒是常能听到吹拉弹唱的声音，因为这里有个出名的大弄堂天乐坊，里面有个不是票房胜似票房的人家——40号李家。半个世纪里，国内凡是喜欢言派京剧的，没有不到这儿来“磨蹭”的。这儿实际上成了言派艺术在南方的大本营。“盟主”就是著名言派艺术家李家载，他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后代。

李家的老五房

李鸿章家族有六房，在上海滩留有很多传奇故事，有政界的、商界的、外交的、科技界的……李家载的祖父一代已经到了上海，除了经营房地产，在戏剧界也很出名，是个很有影响的票友世家。

李家后人在上海的居住地，上世纪初大多都环绕在跑马厅（今人民广场）附近，老二房（李鸿章一支）在威海路茂名路；老三房（李鹤章一支）在威海路黄陂北路；老五房（李凤章一支）原先也住在威海路茂名路，一所叫三茅宫的道观附近，后来由于连遭两次不幸，搬到了静安寺路（今南京

↑ 青年李家载



← 李家载的曾祖父李凤章（左一）

→ 少年李家载（左二）与他的姐妹家珍（右一）、家宝（右二）、家贤

西路）旁边的吴江路，在天乐坊顶下了房子，两代人住了四栋楼。

李家载是李家老五房李凤章的曾孙，父亲叫李国澄。他祖父李经翊一百多年前就已从安徽移居上海。由于他的伯祖李经祐一房无后（李经祐9岁去世，夫人柯氏抱牌位结婚），于是柯氏过继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为子。由于李家载的祖父李经翊原本也是从老六房（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一支）过继来的，他们父子两代人先后都过继给了五房，所以李家载也就算到了老五房的谱系上。

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虽无亲生儿子，却有的是钞票，是李家首富，是李家兄弟中唯一没有上前线打过仗的人，他在芜湖经营房地产，为这个票友世家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条件。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是有名的票友，喜欢谭派戏，能粉墨登场。早年有些名角从北方南下来上海唱戏，就住在李国澄家里，他们常常一起躺在大烟铺上，一边抽烟一边聊戏。李国澄原先住在三茅宫附近一处二进五楼五底的大宅子，那原先是李根源的老房子，还有一个宽敞的庭院。后来发生火灾，还遭遇过强盗上门，为防不测，他们先到苏州避了两年，

从苏州再回上海时，正值浙江兴业银行投资的天乐坊造好，就搬进了天乐坊。

出名的皮大王

李家老五房两代无子，全靠过继，所以儿子特别吃香。到了李家载一代，他上有姐姐，下有妹妹，就他一个男孩，自然更成了宝贝疙瘩。他从小长得虎头虎脑，精力充沛（据说他先天营养过剩，生下来就十斤），皮的本事很大。

李家载有个表弟叫宋湛清（他俩的母亲是亲姐妹，外公沈玉麟曾任轮船招商局经理，晚年住在苏州大石头巷），与他同年生，就是小几个月。两个人一个人高马大，敢冲敢杀，天不怕地不怕；一个从小多病，长得很瘦，个头小，胆子也小，像个影子，整天跟在表哥屁股后头转悠。

有一年他们过10岁生日，家里办堂会，为适合小孩子胃口，请的不是京剧班子，而是请来一个杂技班子表演魔术，还请了很多亲戚朋友带孩子来观看。孩子们自然非常兴奋，那还是住在威海路的时代。

那天一早杂技班子就来了，在院子里搭一个台，拉上布幔，搬进来很多道具。人家在楼下客厅里作准备时，李家载和宋湛清小哥俩从窗口走过，他们好奇地往里看，只见一个伙计把一只活的兔子放进了一个髹，盖上盖子放在一边，然后忙别的去了。

李家载脑子一转，有戏了，对表弟说：“我们把那兔子捉出来玩好吧？”

“好呀！”宋湛清兴致也很高，他一贯是表哥的搭档。

两个人趁大人不备，悄悄溜进去，把兔子从髹里抓出来，又担心被人发觉，因为那髹的分量一下子轻了许多，于是就拿块砖头放进去，然后抱着兔子上楼玩去了。魔术表演开始，当应当把兔子变出来的时候，那兔子总也蹦不出来，演员急了一头汗，伸手一抓，竟是块砖头，惹得台下哄堂大笑。

那时的杂技班子都是些草台班子，常年走街串巷，靠手艺吃饭的。这下出了大洋相，而且是在李鸿章家族的堂会上，传出去不得了，人家丢不起这个脸，只好拱手作揖，向台下讨饶：“各位大爷，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，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李家，请不要开玩笑，把兔子还给我们……”大人们一听，就知道是两个皮大王干的，别人不会干这种事。等到人们迁怒于他俩时，他俩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

两人到了读书的时候仍是皮。家里为他们请了私塾先生，他们不喜欢这



少年宋湛清

个老师，就在老师房间里捉迷藏，甚至晚上爬到老师的床顶上（旧式的红木大床四角有柱，上有顶棚）舞大刀，吓得老师赶紧辞了教席，伺候不起他。

到了读中学的时候，他俩“皮筋”仍旧没有收敛，还差一点闯祸。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为避战火，他们一家又搬到苏州暂住，住在著名的南园一带。李家载被父亲安排到东吴大学附中读书，谁知竟撞上了蒋纬国。有一天学校开运动会，他早早来到了球场。他口袋里是不能没零食的（这是他的终生嗜好），在看台上坐了一会儿就起身买零食去了。这时，正好蒋纬国与一帮小兄弟也来了，阴差阳错地一屁股坐在李家载的位子上。李家载不认识蒋家公子，回来时一看自己的位子被侵占了，伸手就把蒋纬国拎了起来。蒋公子的小兄弟上来解围，被李家载一拳撂倒一个。他身高马大，谁都不在话下，何况他也有他的“跟班”，于是混战一场。等学校的老师赶来，他见事不好，拔腿溜了。事后他知道惹了大乱子，心惊胆战了一段时间，还好蒋家没有与他为难，不久事情就过去了。一年后他回到上海，谁知竟又狭路相逢。有一天他跟女友在一家跳舞厅跳舞，正跳着，从舞厅门口涌进一帮人，他眼尖，认出中间那人就是蒋纬国。他这回识相了，赶紧从后门溜了。

进大学之后继续闯祸。他入读上海光华大学，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，但英语和书法很好，唱歌和跳舞的本事更是与日俱进。这时，他开始注意女孩子，对美女十分倾慕，但是



幼年李家载与父亲李国澄

倾慕的方法还是很原始，他还不明白应当怎样表示对女孩子的好感。他的课桌前排坐着一个外国女孩儿，长得很诱人，李家载总熬不住要盯着她看。有一次上课时，他居然把头伸到前面去了，几乎要碰到那女孩儿的肩膀。他正出神之际，冷不防头上挨了一棒。原来任课的外国老师发现了，用教鞭提醒他。他这种小开脾气哪里肯买账，一拳向老师脸上砸去，把老师的金丝眼镜都打掉了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下真的闯祸了。老师告到工部局巡捕房，捕房发出传票要拘留他。这次他慌了，家里也慌了，连忙四处托人疏通，请客吃饭、送礼是最起码的了。疏通的结果是，可以免除拘留，但必须当面向老师赔礼道歉，还要罚款 300 块大洋。

这回他母亲决心狠狠地惩罚他一下——被罚的 300 块大洋要他从自己的零花钱中“吐”出来，让他扎扎实实地心疼一下，好记住这个教训。赔礼道歉倒也罢了，那 300 块大洋是他过年时，不知磕了多少响头才挣来的呀！人家养家糊口的职员月收入也不过才 30 元。几十年后聊起此事，他还在心疼，那一拳打掉了他 300 块零花钱啊！

言菊朋亲自说戏

李家是个票友大家庭，不仅李家载的祖父母、父母都喜欢京剧，他的外公沈玉麟、表舅任凤苞（盐业银行董事长）也都是知名票友，还有一门杨氏亲戚，全家老少都是票友。这些人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大商人，家里都有宽

敞的宅院，也有自己的“场面”（伴奏的乐鼓班子），遇有喜庆之事总在家办堂会，唱京戏。

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是京戏天才，嗓子极好，吊嗓子时，琴师的胡琴都拉不上去了，他的嗓门还可以拔高。他对谭派戏熟得不得了，也喜欢言派（言菊朋很谦虚，不说自己是言派，而说自己是谭派），家里一天到晚总有票友走动。他是上海文记社的票友，曾向路三宝学戏，收集了很多京剧唱片。凡是北方的名角来沪唱戏了，他总要包很多票子，叫亲戚朋友去看，甚至长期包着包厢。言菊朋早年到上海时还住过李家。各剧场的“案目”（剧场里包揽兜售戏票的人）对李家也很熟，李家拿票不用当场交钱，每年端午和中秋结算两次就行了。

大人爱唱戏，小孩子必然受影响。李家载和宋湛清从小生活在戏迷堆里，耳濡目染，渐渐对京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还特别爱看京剧连台本戏。他俩先是在家里跟着唱片学唱，后来跟着李家载父亲的琴师、同是票友的周梓章吊嗓子，逐渐懂得了京剧的板眼。可是他们的表舅任凤苞（李家载和宋湛清称其五舅）听了还是摇头，觉得这样瞎唱下去不行，得有个正式的高手来教才行。

任凤苞是宜兴人，盐业银行的董事长，晚清官僚任道镕（李鸿章的幕僚）的后代。他自己嗓子虽然不行，但非常嗜戏，干银行南北走动，戏看得多了，对戏也很内行，言菊朋、余叔岩、王瑞芝、许良臣、罗亮生等的戏都看过不少，在戏剧界认识的人也很多。但是李家旧规矩很大，子孙后代可以看戏，可以请戏班子来唱堂会，可以跟着随便唱唱，但是不可以正式拜师学戏。官宦人家从观念上觉得戏子不上台面，是侍候人的下等人。言菊朋原本在财政部任职，就因为公开唱了一次戏被开除了，上司认为他不守规矩，后来他索性正式下海了。但在李家还是行不通，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正式下海，就连正式拜师都不行，尽管他们认识很多名角，懂得很多戏，所以李家载和宋湛清听说谁家的堂会请了大名角，只能偷偷跑去旁听，并不能跟人家正式学唱。

任凤苞与言菊朋非常熟，经济上对言菊朋有过帮助。1931年，言菊朋与荀慧生同来上海演出，这是言菊朋第三次到上海演出，任凤苞带了李家载和宋湛清前去听他的《法堂换子》。两个人一下子听呆了，觉得耳目一新，过去他们只知道谭鑫培和余叔岩的戏好，还不曾听过言菊朋的戏。任凤苞问他们怎么样。“那还用说，是好听呀！”这年他们16岁。

戏演完后他们就跑到后台，由表舅引见，拜见言菊朋。以后言菊朋每次来沪他们都跑去听，戏后就到后台或到言菊朋的住处请教问题。他们俩非常投入，渐渐迷上了言派。言菊朋见他们肯用功，也用心指点。据宋湛清后来回忆说，言菊朋先生教戏非常地道，毫无名角架子，他喜欢哥俩提问题，不怕提问，无论哥俩提什么问题，总是耐心解说，并亲自示范，给他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就这样，他们渐渐得到真传，走上了言派艺术之路。李家载朋友多，社交活动多，有时候时间兜不转了就由宋湛清一个人去听，回来再慢慢转告。他非常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他们跟言菊朋学了几出戏，如《桑园寄子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托兆碰碑》等，其中《举鼎观画》和《法堂换子》只教过他们两个。言派的其他戏他们多半都是听唱片自学的，有的是跟琴师学的。他们虽然没有正式拜师，但的确是得到了言氏的亲授，这使他们受益终身。

有了名师指点，加上自身嗓子好，进步自然就快。李家载的嗓音圆润，音色近似言菊朋，唱起来婉约、流畅、悦耳，经过刻苦的钻研，逐渐对言派艺术那虚实音的巧妙结合有了自己的心得，渐渐“抖”了起来，惹得他周围的戏迷都来“包围”他，他在戏迷圈里很快出了名。

新婚之夜逃出洞房

李家载天生一副好嗓子，音质美。他能真假嗓子兼容共济，运用自如，乐感又好，这大概是他们李家的遗传。

其实他不仅擅长唱戏，还擅长唱英文歌。他最喜欢美国的宾·克劳斯贝，还喜欢跳交际舞，在舞厅里转得疯狂。他读中学时唱英文歌已经出了名，同学间的派对如果缺了他，就觉得是很大遗憾。他读的东吴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，都是海派文化盛行的学校，好嗓子很能派用场。他业余还常常到外国青年聚会的歌舞厅和夜总会去唱歌或比赛，诸如仙乐斯、爱亚林等舞厅都是他喜欢去的地方。他尤其喜欢比赛，常能把外国人比下去，有时看台上的人唱得不好，他心里别扭，上去就抢人家的麦克风，毫无顾忌，典型一个霸道小开。但是舞厅和夜总会的老板很喜欢他，他歌唱得好，又很搞笑，能为大家带来很多欢乐，他夺得冠军后老板会亲自开香槟酒为其庆祝。久之，他荣获了一个“宾·克劳斯贝”的头衔，风头真的不是一点点。

这个会唱戏又会唱外国歌的白净靓哥，自然很讨大家喜欢。虽说民国时

李家政治上早已失势，但经济上尚很殷实。李家载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，依照豪门联姻的惯例，大人们决定把杨家的七小姐（香港影星夏梦的亲侄女）说给他。

杨家祖上也是清廷的大官，其中一个老太爷就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干将杨云史（即著有《江山万里楼诗词钞》的杨圻）。李家从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开始就跟杨家攀亲，把大女儿李国秀嫁给他家。李鸿章的嫡亲长孙李国杰的继室夫人也是杨家小姐（即张爱玲笔下的那位大奶奶）。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跟杨家攀亲，把一个女儿嫁给杨家的杨同复。而且，杨家那五楼五底的大宅就在静安寺路凤阳路，离吴江路天乐坊很近，也是个票友大家庭，全家人都嗜戏，据说言菊朋也去过他家。杨家兄弟姐妹十来个，与李家走动得很勤。李家载的母亲与杨家兄妹的母亲（人称杨五太太）很要好，杨家的小姐与李家载的姐妹也很要好，还结为金兰姐妹。这些年轻人经常通宵达旦地自拉自唱，自演自娱。李家载和宋湛清有时玩到下半夜，索性就住在杨家。

李家载风流倜傥，多才多艺；杨七小姐漂亮文静，心地善良。在大家眼里，他们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无人不说好。但是李家载不愿意，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女朋友了——在舞场上跳舞认识了沈文萃小姐。沈文萃的父亲沈长赓原是与黄金荣同辈的大亨人物，在旧上海娱乐场所很有势力，但是不知遭到什么人忌恨，在沈文萃 16 岁的时候，夫妻双双被人陷害。沈文萃是独养女儿，一下子成了孤独一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家载倒显示了男子汉的气魄，他觉得自己更不能离开她了。

李家载想抗婚，但是家里不依，死活要他娶杨家小姐为妻。李家是官宦家族，面子比天大，无论如何总要门当户对吧！那时李家载的父亲在家里还是有绝对权威的，经济大权在握，你“宾·格劳斯贝”本事再大，总要吃饭穿衣吧。不幸的是，“宾·格劳斯贝”的确只有玩的本事，赚钱的本事是一点不沾边的，况且还要顾及李家的面子及与杨家几代人的情谊，婚约是不可以随便毁弃的。

他在 23 岁的时候，好歹总算答应结婚了。李家为之备置了漂亮的婚房和丰厚的彩礼，按照老规矩，遇有喜庆仍是在院子里办堂会——唱京戏。结婚那天宾客的确来了不少，李家杨家自是喜气洋洋。其实这都是假象，李家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他只是给父母一个台阶下。到了夜间，新郎官突然不见了，



←青年沈文萃



→李家载夫妇和两个孩子

跳后窗逃跑了！

逃走的“宾·格劳斯贝”八头牛也拉不回来，李家载的母亲一气之下病倒了。杨家当然也不依，杨家小姐不能白白被你们“忽悠”，这桩婚姻总得有个说法才行。后来，李母实在没办法了，宣布把杨七小姐收为干女儿，把结婚时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了她。可怜杨七小姐伤透了心，从此再也没嫁人。这场徒有虚名的婚姻直到若干年后才正式解除。

贺龙元帅的发现

1948年，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病逝了，李家的金山银山也吃得差不多了。虽说在芜湖还有些房地产，但是抗战八年兵荒马乱，房租地租常常收不上来，李家人就必须面对衰落的现实。到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李家载、沈文萃夫妇已经有了四个孩子。50年代初，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不能总是一天到晚地票戏了，何况他是这个大家庭唯一的成年男子，他必须走向社会，挣钱养家糊口。

他曾跟几个朋友一起尝试着做点小生意。那时上海西药很缺乏，他们就去香港买药，运回上海供应市场。但是他们太缺乏经验，无法斗过香港的地头蛇。他还去静安寺的一家大酒店工作过，但是一向在家里自由自在惯了的小开，无法忍受被人管的日子，没多久又回来了。后来还是他的姐夫帮了他大忙。他的二姐夫马芳粹（宁波富商之后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，李家宝的丈夫）与表弟宋湛清（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，工程师）研究出了钢丝录音机的制造方法，在当时国外录音机无法进口的情况下，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录音机，创办了一家钟声录音机厂。他们把李家载叫去搞销售，因为他人高马大，嘴巴会说，认识的人也多，干营销员一定不会错。果然，这个家族企业非常成功，最初只有十来个人，却填补了国内录音机行业的空白。适逢国家处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宣传工作是重头，各地宣传部门及民间文艺团体对录音机的需求大增，厂子的规模也不断扩大。李家载越干越有劲，成为厂里不可缺少的骨干之一。

李家载在将近 40 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正式职业，他非常珍惜，工作不敢马虎，但业余时间还是本性难移，仍旧泡在票友中间。这期间他仍在各大票房活动，今天这边请，明天那边请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凡是喜欢言派戏的无不把他当作导师的首选，他家的客堂间也就整天朋友不断。他还常被广播电台邀去演唱并录制唱段，被誉为言派戏的传人。他脑子灵活，善于研究，利用录音机，反复对言菊朋的唱腔作了逐段分析，有独到的心得，唱得好，讲得生动，名气也就越来越大，颇受追捧。

1959 年 12 月，上海戏剧界为纪念言菊朋诞辰 70 周年，在长江剧场举行言派名剧汇演。李家载与言少朋、言慧珠、张少楼等一起演出，主演了《上天台》和《朱痕记》。由于他多年用功，一亮嗓就唱得字正腔圆，华美激越，有振聋发聩之势，博得满场喝彩；他台风又大方，举手投足都是豪门气韵，因此演出非常轰动。

他没想到，这次演出贺龙元帅也前来观看了。贺龙元帅听了他的唱后就向身边的人打听：“这个人唱得很不错，是什么地方人呀？”当别人告诉此人叫李家载，是票友，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时，贺龙同志当即指示说：“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以流落在社会上，应当收到剧团里来嘛！”

50 年代的工作讲究雷厉风行，很快，上海市文化局一纸商调函，发到了徐汇区委工业部和上海录音器材厂（此时他们的钟声录音机厂已经与其他工



李家载指导学生

厂合并为上海录音器材厂)，要求把李家载调入上海京剧院。

商调函中说：“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，经市委批准，同意我局在业余剧团或在职人员中吸收有专长的艺术人才，扩大文艺队伍，充实新生力量。经了解，上海录音器材厂装配工人李家载同志擅长演‘言派’戏。此类人才，我局所属艺术单位非常缺少，故特函商，调李家载同志到上海京剧院工作，希大力支持为感……”

毫无疑问，李家载被当作了急需的特殊人才。那次汇演后仅仅十来天，李家载就被商调到上海京剧院，正式报到是在1960年1月。领导交给他两项任务：一是负责“招待演出”；二是带徒弟，培养新生力量。所谓“招待演出”是为来沪公干的中央首长进行内部的小范围演出；带徒弟，第一个带的是邱正坚，是京剧院领导交给的任务。

杂糅中西传言派

在言菊朋去世后的40年代，言派戏曾一度冷落了不少，这或许与言派戏难唱有些关系，而李家载始终坚持言派的艺术传统，甚至还适当地发展了



李家载唱《卧龙吊孝》(戏照)

言派艺术。言派的特点是儒雅，这或许与他身上的贵族气息吻合。他的嗓音很柔和、宽厚，杂糅了其他流派的长处，还参考运用了西方歌唱艺术的某些特点，尤其是参考了宾·克劳斯贝的发声和换气的特点，用七分真嗓子、三分假嗓子，就把言派戏唱得更好听了，因此受到票友和观众们的拥戴，曾被誉为言菊朋之后的言派领军人物。他对学生说，“我的言派中，有程派，也有余派”，说的就是要广纳百川，杂糅东西，浑然天成，才能够推陈出新，常唱常新。

内行们说他唱言派戏，不仅声似而且神似。有一次，广播电台里播放他的唱段，言慧珠、言小朋与他们的母亲也在收听，全当成是言菊朋的唱段了，结果电台里报出是李家载的唱段，起初他们还以为是电台弄错了，可见李家载功夫了得。

从1960年1月到1966年6月，是李家载艺术生涯最辉煌的年代。当时报纸的演出广告上常常出现他的名字，与之配戏的有李玉茹、童芷苓等，《卧龙吊孝》、《让徐州》是他最拿手的剧目。在这之前他还整理了许多京剧曲谱，如《京剧曲谱·上天台》、《京剧曲谱·让徐州》于195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